

五四时期的蔡元培

顾颉刚

我 1913 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1914 年又考入本科中国哲学系，中间因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，屡次休学，直到 1920 年才毕业。1919 年 5 月 4 日，我正在家乡养病，不在北京，因此没有参加那天的游行。但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，参加过新文化运动，因此，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，多少了解一些。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：北大 1919 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，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。

我考入北大的时候，一直由工科学长（相当于后来的工学院院长）胡仁源代理校长，沙滩的红楼就是由他计划建造起来的。1916 年冬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17 年初，蔡元培正式到任。他满心想把法、德两国的大学学风移到中国来。他办校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学术自由、百家争鸣。

北京大学原名“京师大学堂”，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。蔡元培先生来之前，校名改了，本质并无什么变化，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。1913 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，学校像个衙门，没有多少学术气氛。有的教师不学无术，一心只想当官；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，学问不大，架子却不

小；有的教师死守本分，不容许有新思想；当然也有好的，如教音韵学、文学批评（《文心雕龙》）的黄侃先生，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（他著有《九朝律考》），但不多见。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，有的学生一年要花 5000 银元。当然，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，大约不过两三人。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，少说也有好几十。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，就是穷学生了，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。一些有钱的学生，带听差、打麻将、吃花酒、捧名角，对读书毫无兴趣。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：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，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“八大胡同”（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）。所以妓院中称“两院一堂”是最好的主顾（“两院”指参议院、众议院，“一堂”指京师大学堂）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。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，就是“结十兄弟”。所谓“结十兄弟”，就是 10 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，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，谁的官大，其他 9 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、当秘书，捞个一官半职，“有福同享”。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，那么钻营费由 10 人分摊。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？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！蔡元培先生来学校之前，北大搞得乌烟瘴气，哪里像个什么“最高学府”？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，暇时看看京戏，就算是好学生了。

1917 年初，蔡元培先生来北大，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、质的变化。他到校第一天，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；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、不予理睬的惯例，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，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，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。他到校不久，就向全校发表演说，倡导教育救国论，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，不要追求当官。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、进士，点过

林，但他后来到欧洲德、法两国留学，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思想。他一到任，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，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。他最注意的是文科，认为文科的任务是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。他到校之后就断然聘请《新青年》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（相当于文学院院长），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有新思想、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。

我在 1917 年的日记中曾经记叙过当时的蔡先生：

其一：“蔡子民先生来长吾校，锐意图新，将以农、工、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，大学本科，独留文、理、法三科，文科在沙滩，理科在景山东街，法科在北河沿，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。文科学长自夏仲彝去，改聘《新青年》杂志主编陈独秀。”（2 月）

其二：“先生之为人，诚实恳挚，无丝毫虚伪……其言讷讷也，如不能出诸口；然至讨论学理之时，则又滔滔不绝。”（8 月）

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。他提倡学术民主，主张不论什么学派，只要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就应允许其存在；不同主张的教员，无分新旧，应允许其自由讲学，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。五四运动前夕，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，轰动了全国。林写信给蔡，攻击蔡主办北京大学以来“覆孔孟，铲伦常”，“尽废古书，引用土语为文学”。蔡于 1919 年 3 月 18 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，阐明了自己的办学方针：

对于学说，仿世界各大学通例，循“思想自由”原则，取兼容并包主义……无论有何种学派，苟其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，虽彼此相反，

而悉听其自由发展。

对于教员，以学诣为主……例如复辟主义，民国所排斥也。本校教员中，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，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，与政治无涉，则听之。筹安会之发起人，清议所指为罪人者，本校教员中有其人，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，与政治无涉，则听之。嫖赌娶妾等事，本校进德会所戒也，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，以纳妾挟妓为韵事，以赌为消遣者，苟其功课不荒，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，则姑听之。夫人才至为难得，若求全责备，则学校殆难成立。且公私之间，自有天然界限。比如：公曾译有《茶花女》、《迦茵小传》……等小说 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。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，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，宁值一笑欤？

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，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、陈独秀当教授，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、胡适当教授，还聘身穿马褂、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，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，也登上了北大教坛。蔡先生主校以后，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，一时人才云集，面目一新。像鲁迅（周树人，教中国小说史）、钱玄同（教音韵学）、吴梅（教戏曲史）、刘半农（教新文学）等，都来到北大教书。李大钊、陈独秀和他们一起，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，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，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。

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，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。例如，在他的提倡下，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（最有名的是“少年中国学会”，由李大钊、邓中夏主持）、社团（如“新潮社”等）、研究会（如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、“新闻研究

会”、“书法研究会”、“画法研究会”等),还有“静坐会”等体育组织。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“进德会”,师生都可入会,条件是:不嫖、不赌、不娶妾。学校还开音乐会,办体育运动会,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。总之,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、研究大事上来,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,有健康的、高尚的爱好和情操。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,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、辩论会,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,师生都活跃了起来。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,都有左、中、右,有共产主义者、三民主义者、国家主义者、无政府主义者,有立宪派,甚至有帝制派、复古派(如中文系里的“国故派”),真是五花八门,无奇不有。从那以后,学生们打麻将、吃花酒的越来越少,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。在蔡先生的主持下,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。

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,但不轻视青年人。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,曾经向蔡提出:北大“中国哲学系”应改为“哲学系”,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。蔡先生不因人废言,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,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“哲学系”,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。另一个例子:梁漱溟比我小半岁,投考北大未被录取,他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,蔡先生看了认为是“一家之言”,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,讲印度哲学。

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“骇人听闻”的事是开放女禁。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(王昆仑的姐姐)向蔡先生请求入学,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。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,当时轰动了全北大、全北京。此后招生时,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。

那时，由陈独秀等主编的《新青年》办得非常吸引人，畅销全国。李大钊同志等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许多文章，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。我们学生组织了“新潮社”，由“新潮社”办了一个杂志，名叫《新潮》，与《新青年》相呼应。《新潮》的影响也很大，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，以致再版和三版。那年头，办杂志要赔钱，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，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 this 刊物。我参加了《新潮》的发起和编辑工作。创刊时，主编是傅斯年。1919 年底，傅斯年出国留学，由罗家伦主编。第二年，罗出国，由我接编。我办了三期。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，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，经费不足；再加上印了不少《新潮丛书》一时卖不出去，积压了资金，才办不下去，停了刊。先后参加过《新潮》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、俞平伯、周作人、康白情、何思源等。《新潮》停刊后，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，把《新潮丛书》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，大概卖了不少钱。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，取北京大学和《新潮》杂志的前一个字，叫“北新书店”。

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。如北高师、女师、法政专门、俄文专修、高工、高农等，也仿效北大的样子，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，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。

1919 年 5 月 4 日，北京各校五千多名学生游行示威，有 32 名学生被捕，关在北河沿，其中北京大学就有 20 名。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游行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。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，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。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、商人、学生的拥护，他们举行罢工、罢市、罢课以示支持。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，过几天就把抓去的

学生释放了。

蔡元培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开明的态度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。1919年2月，他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《劳工神圣》的讲演（载《新潮》第一卷第二号），这篇讲演颇能代表他的思想，特抄录于下：

诸君！此次世界大战，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，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，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。我昨日曾经说过，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。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，直接加入的，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，还有什么人？

这不算怪事。此后的世界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！

“我说的劳工，不但是金工、木工等等。凡用自己的劳力，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，不管他用的是体力，是智力，都是劳工。所以农是种植的工；商是转运的工；学校教员、著作家、发明家是教育的工。我们都是劳工。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！劳工神圣！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，不要羡慕那领干股的咨议顾问，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。他们虽然奢侈点，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！劳工神圣！”

固然蔡先生有勇气，同学们也有勇气，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。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，段祺瑞的有力助手、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，炮口对准北大示威。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，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，混上了火车，又到了欧洲，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。

（选自《文史资料选编》第3辑，1979年出版）

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

萧 劳

蔡元培校长一事

1917 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（即文学系），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，当时我的名字是萧稟原。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，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。他聘请了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学长（即文学院长），聘请了周树人、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，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。那时我是一个学生，和蔡先生接触不多，但有件小事使我深深领略到了蔡先生的教育家风度。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，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，我去北大教务处代为申请。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：“座位满了，不能再收。”我说：“座位没满，请你去教室看看。”教务处的先生不去。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。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，也没有秘书阻挡，学生可以随便去找。我一进门，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，便和蔼地说：“你先坐下，休息五分钟，五分钟后你再讲话。”我坐了一会儿，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。我说：“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。教室有座位，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。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？”蔡先生听后，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。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

先生说：“教室确实还有座位，不信你去看。”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。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“准予杜××到中国文学门旁听”，交给教务处的先生。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。

陈独秀学长二事

陈独秀先生那时任文科学长，他不仅是提倡新思想、新文学的一位领导人物，而且对文科教学工作也认真负责，一丝不苟。有两件小事使我终生难忘。

我考入北大中国文学门后，上英文课，当时英文教学按试卷分数编成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班，我被编到乙班。教授是一位英国人，完全用英语讲课，一个中国字不说。我是在河南省立二中学的英文，虽然文法清楚，英文字认得也不少，但听力不行，对英国教授讲课一点也听不懂，便不去上课了。过了一个星期，陈独秀突然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，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回去上英文课？”我说：“听不懂。”陈先生说：“我看了你的英文卷子，成绩很好，怎么会听不懂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在中学是跟中国老师学英文，只能写，不能说。现在英国老师用英语讲课，说得太快，我听不懂。”陈先生便说：“那你就退到丙班吧，还听中国老师讲课。”后来我就在丙班上课了。

中国文学门是由黄侃先生讲授古文。第一天上课就出了个《文心雕龙》上的题目，叫学生作文。我刚写了一百多字，黄先生看见了说：“好！”便拿到讲台上念了一遍。有一天下午上课，我精神有点疲倦，便用手捧头而坐。黄先生看见后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我讲书，你睡觉！”我说：“姿势不对，并非睡觉。”随即放下手，端正了姿势。但黄先生怒气未息，说：“不愿意

听就下去嘛！”我一负气就出去了，接连两个星期没上黄先生的课。又是陈独秀学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去了，问我为什么不上课。我陈述了以上情况。陈先生说：“你是学中国文学的，主课是黄先生讲，你不上课怎么行呢？”我说：“怕黄先生不许我上课。”陈先生说：“好！我送你去。”便拉着我的手，把我送进教室，正好黄先生在讲课。陈先生看我坐在位子上，黄先生也没有说话，陈先生才离开教室。从此我就恢复上古文课了。

钱玄同先生一事

钱玄同先生那时讲授文字音韵学。他是北大有名的教授，很受同学尊敬。有一次，钱先生在课堂上讲到广东音韵，课后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，对他所讲的广东音韵提出了不同意见。下一次上课时，钱先生上台后面带笑容，客气地问：“哪一位是李锡予同学？”李锡予站起来回答说：“我就是。”钱先生说：“请坐，我见到你的信了。你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。我不是广东人，对广东音韵是一知半解。很感谢你纠正我的纰漏。”接着，钱先生在课堂读了李锡予同学的信，还希望其他同学对讲课中纰漏之处提出意见。从这件小事，可见钱先生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。

黄侃先生三事

黄侃先生当时在北大教授《文心雕龙》，他对古典文学有相当深的造诣。他是“国故派”的一位首领，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，黑缎子马褂，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，腰间露出一条

白绸带。有一次他过生日，几位中国文学门的学生登门拜寿，其中有位陈莲痕同学是我的好友。他们进门后行了三鞠躬礼。不料黄先生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。我给太炎先生拜寿都是磕头。你们却鞠躬？！”当时吓得这几位同学只好磕头。

黄先生最喜爱的一位学生叫郑奠，常常给黄侃先生拿皮包。后来郑奠毕业了也在北大任教。有一天，黄节先生（北大讲授诗词的教授）在家里请客吃饭，黄侃先生和郑奠二人都去了。黄侃先生看见郑奠穿着一件皮袍，大为不悦，说：“我还没有穿皮袍，你就穿皮袍了？”郑奠说：“我穿我的皮袍，你管不着我。”黄侃先生听了很生气，从此不理郑奠了。

黄侃先生的脾气古怪，他本来住在一位朋友家中，不知什么缘故和这位朋友闹翻了，搬走的时候，用毛笔蘸浓墨在房间的墙壁上写满了带“鬼”字旁的大字。众人看见满壁皆“鬼”，黄先生才得意而去。

罗家伦二事

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是个风云一时的人物。但他追逐名利慕权势，当时就为同学所不齿。我记得五四游行后的一天晚上，在法科礼堂的学生集会上，罗家伦大肆吹嘘自己，引起与会同学不满，说他“沽名钓誉”、“风头主义”。一位同学就上去把他推下了讲台。罗家伦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，却暗中到太平湖安福俱乐部参加段祺瑞的宴会。有些北大同学得知此事，画了一幅罗在宴会上拿着刀叉吃大菜（西餐）的像，加了注解，贴在北大西斋壁报栏上。同学们看了都很气愤。有位同学写了四句打油诗讽刺罗：“一身猪狗熊，两眼官

势财 三字吹拍骗 四维礼义廉(意指无耻) ”这四句打油诗在北大广传一时。

罗家伦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信，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。蔡先生复信一封，大意是：婚姻之事，男女自主，我无权包办。况小女未至婚龄，你之所求未免过分。这件事在北大传为笑谈。

徐康 整理

(选自《文史资料选编》第 23 辑，1985 年出版)

我所认识的梁启超与王国维

蒋善国

水木清华

清华学校在北平西郊，清华园车站之北。车站即因该校得名。该校向称清华园。其中游泳池、图书馆及科学馆礼堂为近代著名建筑。至于园内旧有建筑，则有工字厅及古月堂。工字厅前花树满院，三春佳日旖旎芬芳。后临荷池，石山起伏，松柏环绕，谚曰：“水木清华”，字迹婉秀可爱。七七事变，清华南迁，日人占为后方医院，摧毁殆尽，几步圆明园之后尘焉。

余于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夏丁外艰，是秋被聘为清华大学助教。时该校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同时开办，适刘寿民先生在大学部授西洋文化史，梁任公（启超）先生在国学研究院授中国文化史，余遂助两先生教于大学及研究院两部。按寿民先生原系余南开大学业师，任公先生亦曾在南大授历史研究法，其七弟述任（启雄）系余之南开同学，余在南中选诗时，曾经述任介绍，请益于任公先生，故助教清华时，与两位先生皆有师弟之谊也。次年，余完全助任公先生授国学研究院课程，并总纂该院《国学论丛》，其第一、第二两期，皆余所编辑也。

该院以吴雨僧（澂）氏为主任，共设五研究室：第一研究室讲师为李济之（济）先生，每周只授人文学二小时；第二研

究室教授为赵元任先生，授普通语言学；第三研究室教授为陈寅恪先生，授东方语言学；第四研究室教授为王静安（国维）先生，授古史《说文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；第五研究室教授为梁任公（启超）先生，授历史研究法、儒家哲学及中国文化史。任公先生性好动，而且富于领导力，故其在研究院时实领导一切，不仅在教授一方面已也。其实该院之成立，完全由于任公一人之提倡。

五研究室中，在成立之初，惟静安及任公二先生有助教。静安先生之助教，为赵斐云（万里）氏；任公先生之助教，则其犹子（侄子）存吾（廷灿）氏及余。次年陈寅恪及赵元任二先生，亦有浦江清及杨时逢二氏分别助教。

该院研究生系论文制，期限一年。第一期之研究生二十余人，内中如吴其昌、陆侃如、周传儒、王力、高亨、余永梁、刘节、罗根泽等，均当时高材生，其后造诣甚深，著述宏富。

高歌一曲

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春王晴漪（名浣溪）^①女士研究散曲，选元、明、清三代南北散曲成册。余于民国十年（1921）以来，因选诗关系，颇好散曲。至此课余与晴漪重新搜集，共同研讨。散曲最初经胡适之先生在《星期评论》中提倡，只就《太平新乐府》一稿，加以评鉴。惟此类散曲专集极僻不易得，故研究乏人，直至民国十五年时散曲研究尚在萌芽。当时不但选本缺乏，即专集亦不多见。此后任二北（讷）及卢冀野（前）氏始辑成《散曲丛刊》及《散曲集丛》、《饮虹簪所刻

^①后为作者之妻。

曲》，先后出版。元、明、清各代散曲作家专集遂重见于世，渐为士林所重。民国二六年（1937）陈乃乾氏辑《元人小令集》出版，而元人小令之总集始，继别集行世，故晴漪之选散曲盖最早。每选一曲，均手缮工楷，字画婉秀，当时并由朱佩弦（自清）氏作序。顾以各人专集，不克尽读，以选其佳作，是以迟至七七事变，尚未付梓，回首往事，已 20 年矣！

晴漪选曲时，每遇佳曲，辄与余共歌之。最喜歌者如《桃花扇·余韵》中之〔哀江南〕套数，原曲虽系传奇，而此套独系北曲，且其词之佳几为散曲之冠。梁任公先生独爱此套，并善歌之，其声雄浑悲壮，凡第一班研究生均聆一二。余与晴漪亦常歌此曲。犹忆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春假，晴漪来研究室，值窗前丁香盛开，浓香满院，高歌一曲，至足乐也。厥后余尚常歌此曲以自娱，友人以吊古之词，尝劝勿歌之，免增忧伤。七七事变后，南京遭炸，甚于明末，金粉新都，复成焦土，余亦不忍歌之矣！

晴漪除选散曲外，并于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春著《中国文学精要书目》一书，盖自梁任公、胡适之二先生所拟书目之后，此为最初研究中国文学之书目也，其书于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冬出版。钱玄同先生为题封面。

二师沉没

余在清华时，值王静安先生之自沉及梁任公先生之染病。静安先生素沉默寡言，清末提倡新学，民初以还，变为研考古史，顶垂发辫，虽在研究院时期，犹未剪去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六月放暑假前一日，研究院全体师生聚餐，共两圆桌，而余适与静安先生并肩坐一席。席间静安先生以余生于黑龙江

省，乃询以东北之鄂伦春民族事，余就所知答之。是日下午余即入城，次日下午返校，甫入清华园西门，见有二夫负一木板归，问负板何用？则答以赴颐和园用此板抬王静安先生尸回校，余闻之惊悼不止。盖前一日聚餐，实未见其有丝毫厌世之意，而于此亦可见静安先生置死生于度外之概。其自沉系 6 月 2 日，正值废历端午之前一日。当时葬静安先生于清华园北墙外农场前，余过其地，辄徘徊不忍去。

在静安先生自沉时，任公先生患溺血症，初入德国医院治疗，继又入协和医院，施用手术。迄未愈而卒。时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一月十九日也。当时清华毕业各研究生全体素服，虔哀祭悼。于逝世前一日，余曾赴协和医院视疾，医生嘱勿见人，遂留名刺书数语而归，乃次日即闻讣音，伤哉！盖任公先生性好动，所谓自强不息者，其在研究室草“中国文化史讲义”，每日约三千言，并指导研究生一切功课。此外每日为松坡图书馆鬻书捐助基金，挥毫不辍，而每晚又必与家人弄麻雀牌，以资消遣，其病纯由于劳累过度。当时名医萧龙友为之诊治，曾谓余曰：“梁先生不能静养，病中犹执卷不辍，如能百日内不看书，余定保其痊愈也。”次年安葬，余亲为执紼，送葬于西山茆地，其墓近卧佛寺，即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任公先生为其夫人营葬处也，至此与夫人合葬焉。

静安先生之学识深邃湛远；任公先生之学识伟大宏博，尤富于组织力，不仅其文汪洋浩瀚，娓娓动人已也。静安先生年 51 岁自沉及任公先生 56 岁病歿，先后相距只一年之久，研究院竟丧二大师。如天假之年，则二先生对于国学，当更有发扬也。

我和胡适的交往

贺 麟

人们对胡适有不同的评价

早在五四运动以前，我在四川故乡上中学时，就知道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个名字。我知道胡适提倡写白话文，主张文章分段和使用标点符号。他举了个有名的例子，即“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”这句话作比方，没有标点符号，既可读作“下雨天，留客天，留我不？留。”也可读作“下雨天留客，天留我不留。”意思完全两样，生动有趣地说明标点符号的重要性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也知道他在美国留学时，就讲文学革命，提倡写白话诗文，并和他的朋友任鸿隽、杨杏佛、梅光迪等有过争论。1917年回国后，他出版了白话诗集《尝试集》，这些白话文书籍对我这样的一些青年人很有吸引力，受到我们的欢迎。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白话文。北京大学有些老教授以及南京大学“学衡派”的人就因为反对白话文而反对胡适。这些人越反对胡适，我们就越喜欢他。

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，我到北京清华大学上学，听到了他的演讲。同年，他的用新眼光、新方法讲授中国哲学思想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出版。以前一般讲中国哲学思想的人，都是从尧舜禹讲起，而他却是从老子、孔子讲起。他重考